

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探析:生成逻辑、具体表征与现实启示

王 波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的生成、发展具有其内在逻辑与表征,对其进行探讨可启示当今学校体育事业发展。研究通过剖析军国民体育、自然体育、民族体育思想交织下的学校体育“救国—人本—国粹”三重价值观生成逻辑,揭示了其形成过程中制度移植与文化适配的困境、科学主义与身体解放的悖论、传统发明与文化认同危机的撕裂。同时,结合有关政策文本、校史档案、历史文献,从“体育课程、体育教学、体育内容”三重微观视角叙事切入,探讨了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生成过程中军事符号日常化与去语境化、自由表象中的权力监控、传统发明与符号化生存的具体表征,并以此为鉴对当今学校体育事业发展提出批判性启示。研究启示:当今学校体育教育应解决“超越工具理性的体育价值观重构”“从科学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范式升级”“从符号传承到民族体育生态复兴”3大关键问题。

【关键词】体育价值观;学校体育;军国民体育;自然体育;民族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5)04-0049-09

DOI: 10.15877/j.cnki.nsic.20250619.001

学校体育价值观是人们对学校体育总体看法、基本态度及基本价值的选择倾向^[1],其实质关乎学校体育教育目的、课程、内容与教学实践等完整教育体系构成,并影响学校体育发展方向。我国近代以来,学校体育价值观的形成与社会体育思潮密切相关,近代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以及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危机共同组建了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形成的“问题矩阵”。在此矩阵下,关于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基本形成了“救国、人本、国粹”三种倾向^[2],然而当今有关研究多聚焦于学校体育价值观形成历程^[3]或个人体育价值观在学校体育领域的投射等方面^[4],对军国民体育思想在学校体育课程设置中影响力的兴衰、自然体育思想所倡导的“本能全面”教学实践演变为新的身体规训以及民族体育思想下学校体育内容陷入“传统发明”与“文化失真”的悖论等问题缺乏深度追问。“救国”“人本”“国粹”3种学校体育价值观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同的实践张力,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教育目的博弈?探索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对破解当前学校体育教育“应试化”“空心化”“西方化”等难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研究以“生成逻辑—具体表征—现实启示”为逻辑主线,通过解读有关政策文本及民国时期部分学校校史档案、文献重构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问题谱系,以期为新

时代学校体育教育发展提供历史启迪。

1 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的生成逻辑:历史矛盾与思想博弈

1.1 军国民体育思想下的“救国观”:制度移植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困境

1.1.1 军事符号的文化解构:从“尚武”传统到殖民现代性

“军国民体育思想”源自18世纪普鲁士王国的“军国民主义”,于19世纪末传入我国,核心思想为“尚武”^[5]。鸦片战争之后,为探寻救国救民之道路,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并最早推动兵式体操在我国传播,为我国军国民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1898年,张之洞派遣姚锡光、

收稿日期:2025-05-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BTY006)。

作者简介:王 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学校体育。

蔡锷等人赴日考察日本军国民体育教育形式,并试图吸取日本立学、练兵、兴革、训练之法以达强国强种之目的^[6]。1904年,其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促使以兵式体操为核心的军国民教育逐渐在学校推广,学校体育逐渐形成了以“尚武强国,强兵御侮”为核心要义的“救国观”,该价值观下学校体育事业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彰显出学校体育教育的国家本位功能。然而,这种兵操制度移植的根本,高度内含殖民现代性的“军事符号”(军事符号是指对士兵、军事设备、部队编制等具备识别标志性意义的合集,此处指我国兵操课程以日本陆军为操典,学生在兵操学习过程中失去对本民族文化学习的认同标志),并逐渐取缔我国传统“尚武”文化当中的侠义精神与天人合一的养生智慧,揭示出军国民体育“去中国化”的文化危机。

1.1.2 身体规训的阶级鸿沟:精英话语与底层实践的断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既崩,却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惨遭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状,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意识到我国现状之改变需进行一场深刻彻底的社会变革,仅在学校普及兵式体操不足以达到“强兵御侮”之目的,还应开设相应军事训练课程以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在教育领域“以体救国”呼声绵绵不绝,其中有蔡锷、蔡元培、蒋百里等代表性人物。蔡锷曾在所述《军国民篇》中对军国民体育思想做出翔实阐释,并建议在学校体育教育中派遣军官充当学校军事教员、在师范类院校开设军事课程、在中小学开设兵式体操训练课程^[7],以此强劲国民精神、增强国民体质及军事武备。然而,以蔡锷、蔡元培、蒋百里等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将体育视为救国良药,但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全国范围内教育资源的差异性。1912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八成以上乡村小学无专职体育教师,体操课程多由其他教师代授,学生动作极为不标准,河北定县农民认为学校里的操喊口令形似农民赶车把式喊号子^[8],暴露出社会底层对体育军事化的理性认识。而对比之下城市学校当中富家子弟则将体操课程视为“西化时髦”的摩登符号,这种身体实践的阶级分化促使军国民体育下的学校体育活动沦为城市学校体育教育中的文化表演。

1.1.3 性别权力的隐性植入:从“强兵”到“强种”的话语转向

蔡元培曾指出:“教育不外乎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种主义”,推行军国民教育有利于民众凝聚爱国与卫国思想。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就学校实施军国民教育提议:“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为体操,并辅以军事技能、知识教授,必要时化学校为军队”^[9],以达“强兵御侮”目的。然而,随着女子教育的兴起,军国民体育在性别叙事下发生转变。譬如,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女子教育首次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其章程分初等、高等两级并均含“体操”一科,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推动了我国女子体育的现代化发展。然而,在该章程以“养成女子德操、必需知识技能及促进身体发育”为教育宗旨下的体操课程内容暗含“贤妻良母”的性别规训。军国民体育思想下的女子体育实际将女性身体改造为“种族延续工具”,以秋瑾为女权先驱的进步人士虽倡导“女学从军”,但在民国建立后,社会环境相对迎来一段相对稳定时期,女子体育在此环境下迅速转化为“卫生体操”,映射出“强国强种”语境下性别平等的局限性^[10]。

1.2 自然体育思想下的“人本观”:科学主义与身体解放的现代性悖论

1.2.1 科学主义的工具化陷阱:从“本能发展”到“数据至上”

1917年,胡适留学归国于北大任教,并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自然主义体育”等教育思想与中国社会现状和教育实践有机结合,为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起到关键作用。胡适认为体育重在参与,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学生体育道德及终身体育思想养成,并在其所著《四十自述》里充分肯定了体育教育的人本价值,同时指出学校体育要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在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传入与传播过程中,学校体育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自然健康,本能全面”为核心要义的“人本观”,该价值观下学校体育事业与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密切相关,彰显出学校体育教育的个人本位功能。然而,在自然体育思想指导下的学校体育活动于实践解放过程中逐渐被理解简化为以“数据至上”的科学锻炼。譬如,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中关于专科以上学校体育实

施方案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每月需进行体重测量、卫生习惯等检查,每学年需进行一次体育测验,学生即使在肄业期内,各种运动至少须达某种标准,方为及格,否则不予毕业^[11]”,在此规定下出现学校将体育测试不达标者列为体育差等生,并强制其参与额外训练的现象。这种将身体锻炼视为“可计算机器”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然教育的初衷。

1.2.2 儿童中心的祛魅:自由表象下的规训升级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源自卢梭的“自然教育论”,其核心内容为“体育要顺应儿童身心自然发展而进行,使儿童成为身心健康、自由平等和具有博爱精神的自然人”^[12]。在卢梭提出“自然教育”之前,其所处社会教育主流价值观尚处于“人性本恶”^[13]阶段,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限制儿童本性以此消除儿童罪恶。而随着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发展,卢梭等人提出“自然教育”的观点,赋予了教育“人本化”内涵,即突出儿童在教育中所处的主体地位,教育活动开展要遵循儿童发展天性,为后来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辟了理论道路。自然主义思想下的学校体育教育倡导“游戏教学法”,但从西方所引进的“游戏教学法”暗含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纪律要求,其倡导将自由游戏转化为标准化竞赛过程。而标准化的竞赛过程实质是用“科学管理”以平替“军事命令”。譬如,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体育课程游戏教学案例显示,授课教师将“老鹰捉小鸡”游戏改编为“分队竞赛”,并规定胜负规则与违规罚站处置程序^[14],这种游戏竞赛法下的自由表象比军国民体育下的身体规训更具隐蔽性。

1.2.3 性别身体的二次建构:从“禁足”到“规训”的范式转换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传入我国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开始追寻对近代学校体育的本质理解,军国民体育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体育“救国观”受到挑战,学校体育价值观发生转变的思想条件已然成熟。陈独秀认为:“教育儿童要使其各种感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自由生长发育”,对于学校体育中的兵式体操内容,其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新时代青年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是进步的而非落后的,而不应给青年灌输兵式体操当中的杀敌

技巧,其有违人性发展本能。他提出将“游戏、体操、手工、图画”等作为发展学生各种器官、肢体感觉、道德情感等本能的工具^[15]。在此倡导下,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规受新文化运动与自然体育思想影响开始建立新的性别秩序。譬如,1933年《良友画报》等公众媒体大肆渲染杨秀琼身着紧身泳衣的体育美女形象,并冠以其“美人鱼称号”,此报道在上海滩新潮女性中掀起“游泳热”,以致当时高档商店泳衣脱销^[16]。此种“解放与物化”的合谋,将女性身体转化为消费符号的方式揭示出自然体育思想当中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

1.3 民族体育思想下的“国粹观”:传统发明与文化认同的撕裂

1.3.1 国术的现代性改造:从江湖技艺到国家符号

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产生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社会现状息息相关。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以具有政治性的民族为中心,以该民族及国家为最终效忠对象的一套既定思想、信念和行为”^[17]。在民族体育思想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学校体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维护传统,复兴民族”为核心要义的“国粹观”,该价值观下学校体育事业与维护民族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密不可分,彰显出学校体育教育的社会本位功能。随着民族主义体育思想产生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和强健国民体质三大功能得以奠定^[18],以中华武术为代表的“国粹”体育项目所展现出来的社会价值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部分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体育教学中从具备浓厚江湖元素的技艺改造为内含国家元素的象征符号。“太极操”成为标准化改造的典型,1930年吴图南编写《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将传统太极“以意导气”简化为“关节活动操”并以运动生理学为理论基础辅以图识,使其易于普及^[19]。然而,当传统体育项目被剥离其文化语境,国术传统魅力的流失将使其沦为民族主义的空洞符号。

1.3.2 土洋之争的意识形态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困境

面对西化浪潮,以维护传统体育文化为出发点的“国粹”主义者将传统体育与国家安危存亡连接^[20],提倡以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发涉及体育本质理解及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土洋体育”之争。“国粹”主义

者主张在学校体育体操课中以武术代替西式体操或扩大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及社会当中的影响,代表性人物有蔡元培、张之江等人。蔡元培1928年在《全国教育会议闭会词》中倡议“学校体育尤其要注意国技之应用”,表现其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视。以“西化派”代表袁敦礼为核心的“科学化体育”阵营则批判“独尊国术是抱残守缺的文化自欺”^[21]。“土洋体育”之争暴露出民族体育思想及西方教育思想在我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深层矛盾:现代化手段保存传统与恐惧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

1.3.3 地域文化的边缘化:从“多元共生”到“中原中心”

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军国民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与传播,但并没有解决当时的民族危机,其实际作用有限。清末民初,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时代命题下,中华民族区别于“他族”的民族主义意识被逐渐唤醒。在民族主义意识觉醒过程中,有人发出“发展我国体育,不可不从我国实际出发,注意国情”的结论^[22],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杨莹^[23]认为“武术是救国之要图,卫国之优美国粹”,其开展意义与新文化并重。然而,当武术被昭定为“国术”的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蒙古族摔跤、苗族赛龙舟等)却被拒在学校体育主流体育课程之外。虽然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以促进边疆教育普及与发展,但全国各级学校实际教学过程中边疆传统体育仅作为“文化点缀”出现在节庆表演中,其国术教材内容设置仍以少林、武当为正统,以汉族为中心的体育活动取代了传统体育的多元生态,呈现出“中原中心”的地域文化建构。

2 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的具体表征:矛盾外显与场域实践

2.1 “救国观”下的体育课程:军事符号的日常化与去语境化

2.1.1 兵式体操的符号暴力:从军事训练到身体政治

在军国民体育思潮影响下,清末民初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程逐渐在学校推广,以“尚武强国,强兵御侮”为核心要义的学校体育“救国

观”逐渐被人们所认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建立以兵式体操为核心的学校体育教育课程,近代以来兵式体操所显意义和实用价值愈受人们重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也正式得以确立^[24],并被赋予“强兵御侮”之重责。然而,部分学校兵式体操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学生身体视作“军事零件”(指忽视学生“人”的身份,将学生视作如枪械般的军事工具)的训练方式暴露了军事体育与教育本质的冲突,揭示了学校兵式体操课程从军事训练转化为身体政治的符号暴力荒诞性。譬如,河北定县农村学校因缺乏枪械类教学用具常以竹竿代替步枪,却依旧要求学生像军队士兵训练一样瞄准星,有学生在作文中写道,“竹竿操是木头做的战争,我们是假装的士兵”^[8]。

2.1.2 童子军训练的功能嵌套:战时动员与公民教化的共生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我国传播,军国民体育思想在学校体育中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兵式体操受制于社会环境和时代局限性并未完全退出学校体育教育历史舞台,其转换为童子军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并在各级学校普及^[25]。在此时期,以“尚武强国,强兵御侮”为核心的学校体育价值观具体表征为童子军系科的设置。童子军系科课程学习内容主要为野外露营、远足、丛林追踪、急救、跟踪敌人、侦查信号^[26]等与军事相关的技能,并在战时与非战时两个方面采取不同形式,以达“战时动员与公民教化”之目的。在战时,童子军系科课程体育教材的设置针对环境之需常采用救护比赛、搬运竞走、障碍赛跑、掷手榴弹比远或比准等教材,训练后方服务及国防应用技术对新一代青年爱国主义思想凝聚起到良好效果,使体育与爱国相统一。在非战时,童子军系科则设立与军事相关课程内容以备战时之需,如方位辨识、侦查露营、英文双旗语、英文单旗语、测量、裂团救护等内容^[27],以此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学校体育“救国观”下,此种战时与非战时交融的课程模式,促使童子军体育课程成为国家机器与平民社会生活的缓冲地带。

2.1.3 空间仪式的规训效应:从教学场所到“想象的战场”

在以“尚武强国,强兵御侮”为核心价值导向下

的学校体育教学场所实质上成为学校体育军事训练仪式的展演空间。据《清华周刊》记载,清华大学每日早操需组织学生齐唱《黄河颂》向国旗行军礼,并在“振兴中华”的嘹亮口号中完成队形队列变化^[28]。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国立师范学院体童科为锻炼学生野外生存军事技能组织学生进行野外生活实践,史料记载:“本院5月3日上午,赴离院35里外之扬子江露营,进行升旗、晨操、野外营地建设等,活动均按预定计划一一举行。”^[29]将体育教学空间转化为“微型战场”的仪式实质是通过身体体验构建国家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在此“想象的共同体”下学校体育对于教学空间的规训完成了从“操场到战场”的意识转变,军国民体育思想下的学校体育“救国观”最终落实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身体规训体系。

2.2 “人本观”下的体育教学:自由表象下的权力监控

2.2.1 空间重组:从“行列式”到“强制化”的管控升级

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传入传播及社会各界对体育认识加深,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体育的真义,并更加重视体育对走、跑、跳、投等人类基本生存活动的培养^[30],追求以“自然健康,本能全面”为核心要义的学校体育“人本观”开始成为社会主流。然而,“人本观”下的体育教学虽告别了以往兵式体操“行列式”的教学模式,采用自然“分组教学”赋予学生学习自由,实则依旧为建立新的管理秩序,以实现对学生管控。此种管控在体育教学过程当中表征为对学生实施具有强制性质的学习规定。譬如,西方国家在我国早期兴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为推动体育运动快速普及,实际上对学生进行“强制化锻炼”,要求学生实施两年强制体育运动,全体学生修满4个体育学分才能予以毕业^[31]。这种强制化学习制度将学生身体活动纳入可计算的时空框架,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权力的描述:“权力并非仅通过暴力或法律直接压制,更多是通过规训这种隐蔽机制实现”。

2.2.2 评价体系:从“军事考核”到“数据至上”的范式转换

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各级各类学校“体操科”更名为“体育科”,并增添生理、卫生学等理论科目,同时加大了球类、田径等体育活动的普及,定

期对学生健康检查,且尤为注重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发展。譬如,著名体育家田二新在教授学生掷铁饼时便一边示范掷铁饼时所需运动技巧一边讲解相关解剖生理常识^[27],使学生运动技能的掌握由理论与实践分离阶段,上升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段,促使学校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但在此过程中,伴随西方体育课程引入所构建的“量化评价”体系对学生学习产生了新的压迫,学校体育教学评价由“救国观”下的“军事考核”转变为“人本观”下“数据至上”的量化考量。譬如,1941年,《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体育成绩考核应按如下标准执行“技能测验30%、运动精神25%、出席情况25%、体育常识20%,体育成绩总分满60分者为及格,测试不合格不予毕业”^[11]。在此种规定下,学校体育教学完成了对学生身体规训的“科学化与合法化”。

2.2.3 性别叙事:从“禁足”到“身体美学”的隐性控制

自然体育思想的传入与传播推动着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运动普及与发展,然而在“自然健康,本能全面”的“人本观”下,女子体育运动蕴涵着新的性别规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良友画报》频繁刊登“体育美女”画报,将女性身体转化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消费符号,这种叙事在各级学校体育教学中体现在课程内容设置的偏向性上。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为例,其每个季节课程设置都包含“体操、舞蹈、韵律活动”三门^[32],以增加对女性身体的规划训练,发展女性身体之特长。也有学校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要求女子需维持“淑女形象”,如在女子篮球赛事中特别规定不得在三秒区内冲撞,其理由为剧烈冲撞有损淑女形象。因此,在“人本观”下的学校体育教学活动实际上包含着对女子体育活动开展的隐性控制,其表面推崇“身体解放”,实际上是用西方美学标准来重新构建女子的身体规范。

2.3 “国粹观”下的体育内容:传统发明与符号化生存

2.3.1 知识体系的去语境化:从“江湖技艺”到“标准化课程”

在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影响下,我国近代以中华武术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逐渐普及,以“维护传统,复兴民族”为核心要义的学校体育

“国粹观”影响不断扩大,促使传统体育项目课程地位提升。一批主张以“复兴传统”、效仿“文艺复兴”的国粹主义人士认为我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马”等具备“江湖元素”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更加适合国人体育需要,各级学校体育课程设置应以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为主。譬如,受当时内忧外患之国情影响,著名体育家陆佩萱曾指出:“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应以体育为武备,训练以切用之国术,并辅以田径、球术,以此达到保家卫国之目的。”^[27]在学校体育弘扬“国粹”的价值观下,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逐步列入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课程,地位一步一步提升。1914年徐一冰主张将武术更改为国术并列入各级学校体育课程,1915年北京体育研究社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1916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建议将《中华新武术》列入各级学校体育武术教授参考书目^[33]。

2.3.2 文化符号的政治化挪用:从“民间项目”到“民族象征”

随着传统体育项目课程地位提升,各级各类学校课程内容设置中增添不少民族传统体育内容,如“单人锻炼、团体锻炼、单拳、武器、对拳、武器单打”等内容,其课程目标主要表现为弥补军事体操之不足,发扬国光、练习实用技术。同时,以国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体育课程中占比及门数不断增加。譬如,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17门体育学科课程当中,含有“国术理论、国术研究、国术教学法、国术精义、国术史、国术实施法”6门国术理论课程,体育术科课程当中国术课程量也是占据首要地位^[34]。此外,国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代表,因其在形式和功能上与西方兵式体操相似,被赋予浓厚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实质成为对抗西方军事侵略、文化渗透、宗教输入的一种象征符号,并作为中华民族主义意识的载体登上历史舞台作用于学校体育及社会方方面面。

2.3.3 地域文化的等级秩序:从“多元共存”到“中原中心”

我国近代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在“国粹观”影响下,存在着明显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课程内容中心主义。据北京体育研究社1924年对全国40所大、中学校调查显示,传统武术列为正课比例达52.5%,课外武术活动开展比例达22.5%^[35]。此外,以中华武

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开展逐渐衍生出对不同派系内容的规训。如中央国术馆教材内容的设置以中原地区少林、武当武术为正统,而岭南咏春、福建南拳等项目则被视作“旁门左道”。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国术教材内容的分配仅分为少林派与武当派拳术两类^[34],边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与其在国术教材中的设置较为弱化。同时,传统体育项目发展也易因“人口、分布、语言”等原因出现“去文化”现象。譬如,裕固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因受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民族文化冲击逐渐出现传统体育文化衰亡^[36]。此种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课程内容中心主义逐渐迫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从“多元共存”向“中原中心”转变。

3 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的现实启示:历史镜鉴与当代重构

3.1 从“救国”到“强国”:超越工具理性的体育价值观重构

3.1.1 解构“数据至上”,重建体育育人本位

在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人本观”的宏观叙事下,学校体育将学生身体及规训视作“可计算机器”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在运动中的情感体验与品格塑造。因此,为避免当今学校体育重蹈“数据至上”的教育陷阱,需打破传统体育教育中“唯指标论”的应试思想,重建体育育人价值本位。譬如,芬兰中小学“探索自我、学校引领、能力为要”^[37]的三维核心教育理念与模式更有利于学生个性化成长、自我探索及全面发展。我国当今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可以此为鉴,建立“健康档案、运动创造、情绪管理”等多维培养与管理模式,弱化学校体育教育中的数据排名竞争,增加对学生个体进步追踪。

3.1.2 超越“军事隐喻”,构建柔性爱国主义教育

在我国近代学校体育“救国观”的宏观叙事下,学校体育被视作“强兵御侮”的国家工具,学生身体、体育教具、场所等在一定程度上亦被视作“军事零件”,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遭以忽视,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当今国防教育的开展可尝试构建柔性爱国主义教育模式,以情境化运动体验代替“喊号子”式教育,促进学生爱国情怀在自然体育教育中生长,促使学校体育教育超越“军事隐喻”,明晰体育本质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载体,摆脱

其军事化训练过程中的工具属性。譬如,江西南昌等地可在“建军节”等节假日依托当地自然环境组织学生重走“长征路线”,模拟红军长征过程中伤员搬运、火线穿越等场景,将体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

3.1.3 平衡“体育需求”,建立分层教育体系

在军国民体育叙事视角下的女子体育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有发展为“种族延续工具”的隐性倾向,该种倾向下的学校体育通过体育活动提升女子素养使其服务于家庭、社会,其有关学校体育课程设置及政策文本教育宗旨也暗含着对女性“贤妻良母”式的身体规训。譬如,《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养成女子德操、必需知识技能及促进身体发育”的教育宗旨暴露出当时社会将女子身体视为“工具”的落后思想以及对女性群体身心全面发展需求的忽视。因此,当今学校体育教育可尝试建立“必修+选修+特修”分层课程学习体系,以回应不同群体“体育需求”。其中,必修课程面向全体学生以保障学生基本体能发展,选修课程提供多元选择发展学生兴趣以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特修课程则面向特殊人群开发适应性项目(如盲人门球等),并通过“融合运动”以促进不同群体共同发展。

3.2 深化“自然健康”理念:从科学规训到生命自觉的范式升级

3.2.1 抵制“身体工具”,守护体育游戏属性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传入我国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体育教育事业进步,但其实践过程亦存在“自由表象下的规训”矛盾。“自然教育”核心是解放与尊重儿童天性,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人本观”下的学校体育教育也难逃其科学主义般的工具属性,需服务于“强兵御侮”的国家需求。因此,当今学校体育教育要时刻警惕体育游戏发展为具备工具属性的身体规训,守护体育游戏自然属性。譬如在当今体育课堂教学中,低学段可推行“无结构化运动时间”,让学生自由探索和参与体育游戏,教师则仅作为学生安全守护者及游戏建议者,解放学生自然天性。

3.2.2 突破“性别规训”,构建身体容纳文化

我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波澜曲折,从传统劣习中的“禁足”到西方文化中的“身体美学规训”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子体育发展的进步性,然其用

新的性别权力结构代替旧有规训的实质并未改变,社会对女子体育固有的性别偏见也并未消除。因此,当今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应做出应有回应以突破传统体育观念中对女子体育教育开展的“性别规训”,构建多元的身体容纳文化体系。譬如,在学校课程设置上取消项目性别限制,允许男女共同参与传统“性别专属”运动(如橄榄球等);在体育师资培训上,规范教师评价学生术语,禁止教师以“不够阳刚、不够淑女”带有性别偏见用语评价学生;在校园文化推广上,推广无性别限制社团、积极开展男女混合体育运动。

3.2.3 融合“自然教育”,重建身体环境联结

在我国近代学校体育“人本观”的宏观叙事下,学校体育的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军国民体育思想下学校体育“尚武强国,强兵御侮”的教育目的,体现了当时体育教育理念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步。然而,自然体育思想下学校体育教学亦存在不足之处。如当时教会学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发展,但其以室内体育教学为主的方式及强制运动的规定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如圣约翰大学)。因此,在当今学校体育教学中应警惕与防止身体教育与自然教育的割裂,在学校教育中应发展学生天性,重建其身体与环境联结。譬如,学校体育课堂教学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可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开展,建立“自然体育营地”,设置越野障碍、树木攀爬等设施给学生提供亲近自然机会,加强学生身体与自然联结的实践场域。

3.3 升华“民族国粹”内涵:从符号传承到生态复兴

3.3.1 解构“国术神话”,重建传统体育多元谱系

在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国粹观”影响下,学校体育承担着“维护传统,复兴民族”的社会本位功能,该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民族精神的功效,但也由此衍生出了以中原武术为核心的“中原中心”主义,边疆体育文化与项目发展滞后,不利于传统体育多元化发展。因此,当今学校体育发展应打破传统体育发展的“中原中心”主义,重构传统体育多元谱系。譬如,运用区域链技术实施“全国传统体育项目进课堂”推广计划。在民族地区试行“1+X”课程模式,以国家规定课程为核心、以本土项目为多元谱系,推进传统

体育运动项目传承与创新。

3.3.2 超越“土洋对立”,推动传统体育现代转译

“土洋对立”的实质是国人为追寻对体育本质理解及我国学校体育发展方向所作出的深入追问。在我国近代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军国民体育思想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传入对我国本土所孕育的体育思想及传统体育项目产生一定冲击,但传统体育在“尚武强国,强兵御侮”与“自然健康,本能全面”的价值导向下,学校体育由此也确立了“体育是人的教育”观念,将我国传统体育项目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此叙事视角下,当今学校体育的发展应避免出现“土”与“洋”的对立,积极推动传统体育项目现代化转译,以人为本发挥其文化内核。譬如,从武术运动的价值叙事出发,可将武术运动中“止戈为武”的“武德”与校园欺凌防治相结合,以“攻防技术”学习,预防与化解“校园霸凌”,促进传统体育元素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3.3.3 激活“地域文化”,构建传统体育绿色生态

在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国粹观”的叙事视角下,“武术”被昭定为国术的同时,学校体育发展逐渐出现地域文化边缘化现象,近代国术教材以少林、武当为正统的构造,忽视了我 国地域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我国近代学校体育课程中传统体育项目内容设置的厚此薄彼不利于国家、民族凝聚力提升。因此,当今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尤应注意激活“地域文化”,构建传统体育绿色生态系统,促进传统体育与地域文化发展。譬如,可尝试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地域文化系统,家庭层面邀请非遗传承人课后指导,学校层面积极开发基于地域文化的校本课程,社区层面依托传统节日大力举办“民俗体育运动会”,三位一体助力“民族国粹”项目从符号传承到生态复兴。

4 结语:在历史矛盾中寻找体育的主体性

我国近代百年学校体育价值观生成与演变的实质是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与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寻找体育主体性的挣扎历程。军国民体育的“救国焦虑”、自然体育的“人本悖论”及民族体育的“国粹迷惘”共同催化了我 国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现代化历程,学校体育事业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交织,并彰显出学校体育教育“国家、

个人、社会”多层本位功能。当代学校体育教育改革需以史为鉴,避免学校体育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将学校体育教育简单“空心化、应试化、西方化”;此外,学校体育教育主体性构建应基于对历史矛盾的深刻认知——在国家叙事中保留个体尊严,在科学理性中守护身体感性,在传统继承中激活现代性潜能。近代学校体育价值观生成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实践张力本质上是对“教育本质”探索的抉择,而体育教育开展不应存在塑造“合格公民与自由个体”的单一抉择与追问,这种抉择与追问应成为推动学校体育不断发展与革新的底层动力。

参考文献:

- [1] 范巍,马云鹏.我国学校体育价值及价值实现路径探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3,32(5):101-103,116.
- [2] 崔乐泉.社会思潮影响下国人近代体育观变迁研究[J].体育学研究,2018,1(1):49-61,82.
- [3] 尹作亮,戴俊,王立杰.建党百年学校体育价值取向的变迁历程、特征与路径选择[J].体育文化导刊,2022(3):91-97.
- [4] 周妍,李启迪.中国近现代体育教育家学校体育观共性特征、思维立场与未来展望[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1):125-135.
- [5] 律海涛.中国近代军国民体育思想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3):95-99.
- [6] 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 [7] 刘敏.中国近代名将蔡锷军国民体育思想及其历史价值[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4):34-37.
- [8]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
- [9]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 [10] 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1]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M].南京:正中书局,1941.
- [12] 李刚.评析卢梭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特质[J].体育科学,2012,32(4):77-83.
- [13] 吴璇.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对我国近现代中学体育课程目标的影响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9.
- [14] 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 [15]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样[M]//戚谢美,等.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 [16]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杨秀琼:泳池内外的沉浮[EB/OL].(2009-07-22)[2025-06-11].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9-07/22/content_2767891.htm.
- [17] 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J].世界民族,1999(1):

- 2-12.
- [18] 王纯,王柏利.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6,35(6): 128-133.
- [19] 吴图南.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20] 成功伟,蔡强.民国时期国术教育的推行与困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49(5): 22-29.
- [21] 袁敦礼.体育科学化之研究[J].体育季刊,1933(2): 35-42.
- [22] 田标.近代中国体育嬗变:民国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转型[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4): 51-54.
- [23] 杨莹.我之武术观[J].武术,1921,1(2): 4-5.
- [24] 程传银,邹兰.纵论我国近现代主要体育教学指导思想及其历史影响[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3): 15-18.
- [25] 吴小玮.民国童子军的体育训练——兼论对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启示[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44(5): 120-126.
- [26] 张鑫,卢天凤.童子军教育及其对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启示[J].青少年体育,2022(2): 89-91.
- [27] 成烈体育师范出版委员会编辑.成烈体育师范学校概况[M].苏州:成烈体育师范出版委员会,1933.
- [28] 清华周刊编辑部.早操实况记录[J].清华周刊,1915(39): 12-15.
- [29] 国立师范学院.国立师范学院课程大纲[J].国师旬刊,1941(36): 173.
- [30] 曾吉.论自然体育思想及其实践意义[J].体育文化导刊,2007(6): 95-97.
- [31] 赖昌南.民国教会大学的体育实践:以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中心的考察[J].体育学刊,2023,30(6): 104-109.
- [32]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编.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系概况[M].河北: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936.
- [33] 崔乐泉,杨向东.中国体育思想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4] 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编.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概览[M].北平: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1936.
- [35]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 [36] 潘嘉峪.“文化边疆”视角下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研究[D].广州:广州体育学院,2022.
- [37] 李洁,周美玲.芬兰中小學生生涯教育的核心理念及实施路径[J].教育探索,2024(10): 81-86.

Value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Generative Logic,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WANG B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s of school sports in modern China have their inherent logic and manifestations, the exploration of which can inspir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hool sports. Under the interwoven ideology of military national sports, natural sports, and national sport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lemma of system transplant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paradox of scientism and physical liberation, and the tearing between traditional inven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chool sports' triple values of "saving the nation-humanism-national essence". At the same time, in combination with relevant policy texts, school history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study takes a narrative approach from the three micro-perspectiv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ntent" and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normalization and de-contextualization of military symbols, power monitoring within free manifestations, and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raditional inventions and symbolic survival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values in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is, critical insights are proposed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It is suggested that contempor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address three key issu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orts values beyo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paradigm upgrade from scientism to humanism, and the revival of national sports ecology from symbolic inheritance.

Key words: sports values; school sports; military and national sports; natural sports; national sports